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研究丛书》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

Chines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Thought (1912-1949)

何爱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受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自选项目基金资助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

何爱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何爱国著.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 1

ISBN 978-7-5100-7305-2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现代化—思想史—研究—中国—1912～1949 IV. ①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1619 号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 (1912-1949)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7305-2/K·0191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一

姜义华^[1]

现代化,包含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信息化、世界化以及与此相应的国家政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国际秩序巨大变化等众多方面、众多层次的内容。现代化造就着现代契约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城市文明、现代技术文明、现代信息文明、现代世界联系,造就着现代人的价值体系、政治与社会存在方式,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既为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常常将人们引向一种新的异化。

如市场化,带来物流、资金流、人流、知识流的解放,但同时又常常会使人人与人之间用契约关系、货币关系、利益交换关系取代了原先的自然联系、情感联系,以及因相同价值观、相同意志、相同文化追求形成的多重社会联系。

工业化,带来劳动的解放,但同时又使人的生存与成长、人的全部活动,越来越受制于外在于人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乃至社会力量;工业化不断追求高度发展,会纵容、鼓励和引导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利欲不断膨胀相联系的,是物欲的不断膨胀,义与利严重失衡,道与欲的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化趋向亦因此难以遏制。

城市化,人口、资金、人才、知识、信息、生产力、消费都高度集中、特别密集,创造了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但这一切常常又同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使人在巨大的城市中,反而过于个人化、孤独化,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更导致纵欲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同时又使人们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所支配,丧失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的追求。

信息化,使互相全面依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会使人与人的交往虚拟化,人

[1] 姜义华,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章炳麟评传》、《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中华文明的根柢》、《信史立国》、《史学导论》等。主编《中国文化通志》、《中国通史教程》、《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史学卷》、《中国文化读本》、《康有为全集》、《胡适学术文集》等。

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工具理性所支配。

世界化，使人们有机会享用全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成果，但也可能使人们完全为外部力量所主宰，而彻底丧失自我，如此等等。

至于国家政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国际秩序，人们的价值体系、政治与社会存在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空前的变革几乎无一不是一柄双刃剑。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确定现代化目标以及选择自己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走的道路时，必须非常认真地总结先前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一条能够有效制约上述新的异化而真正能够将人们引向自由而全面的道路。

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在路径选择上，既依次递进而又互相重叠的多种倾向一直不断地在激烈地互相博弈。人们所设计和鼓吹的数十种乃至上百种现代化方案，大要说来，基本上就是以下三类。

其一，中国现代化运动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挑战。最初，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声光电、机器工业，震动了中国；随后，西方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文化制度，震动了中国；再后，西方个人本位、利益最大化、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等核心价值观念，震动了中国。中国以西方这些成就为坐标，对自己重新加以审视和检讨。

其二，中国现代化运动开始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日益暴露，以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已经勃兴。这样，当中国充满期待学习西方时，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之痛的中国志士仁人更容易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种种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并天然认同这些揭露和批判。于是，中国又开始了以西方社会主义为坐标的现代化路径探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这一探索更集中表现为“以俄为师”。

其三，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型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强固文化与制度传统的巨型文明，中国又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型国家，师法他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原有的根底。师法他者时，曾一度产生过“万事不如人”的悲观情怀，但更多智者早早就发现，师法他者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都无法全面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真实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必须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是中华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扬弃、自我更新。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运动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一直是一个极为强劲的诉求，并最终取代前二者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流。

现代化运动是一个可能要持续几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指望有一个包罗万象的方案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各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巨型国家，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探索、实践、总结，再探索、再实践、再总结，才能够通过全面、深刻的自省、自知，一步步达到自觉、自由的境界。套用孙中山先生一句名言：现代化尚未成功，老同志仍需努力！

序二 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何传启^[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不缺思想，缺的是思想绽放的土壤。
君不见，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奠定中华民族的文明根基。
君不见，唐宋盛世，文星灿烂，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自古以来，没有理论创新的民族，就不可能引领世界潮流。
君不见，前有古希腊，后有文艺复兴，奠定西方文明基石。
君不见，前有科学革命，后有启蒙运动，引发世界现代化。

在18世纪以前，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辉煌历史，曾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农业发达国家。18世纪是世界现代化的分水岭：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中国传统文明走向相对衰落。在19—20世纪，中国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19世纪中叶以来，无数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而上下求索。20世纪中叶以来，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把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向上。21世纪将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研究现代化，服务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历史责任。

在英文里，“现代化”一词产生于18世纪中叶；在中文里，“现代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研究”大约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比西方约早20年。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破坏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打断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

何爱国博士的力作——《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系统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现代化的种种思考和理论探索。全书包含三编十五章，涵盖经济与社会、思想与文化等诸多领域，涉及现代化共识的养成、儒家与现代化等诸多重大话题。

知往鉴今，发人深省。中国现代化，不仅要有民族自觉，更要有民族自信。

心有多高，路有多远。是为序。

2013年9月26日于北京中关村

[1] 何传启，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专著有《现代化科学：国家发达的科学原理》、《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等。主编中国现代化报告系列、《第二次现代化丛书》、《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丛书》。

序 三

盛邦和^[1]

何爱国近有新书《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详论中国民国时期经济思想实态，来信要我写序。爱国是我的学生，随我读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接获书稿，放下手中杂事，埋首展卷。假如一本书，能够搜集大量的资料让人有饱餐信息的快感；假如一本书，在综合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有益的思想，启益今人，思考当前的问题，那就是一本好书。这两点，爱国新书都做到了，这是一本好书！

本书读完，掩卷长叹！回首近代是如何从一个进步经济思潮，坠落到民国期间的落后思潮，然后改革开放，回到进步思潮，这“正一反一正”三题转折是怎么过来的？民国经济思潮下行式转折起于1914年，会不会百年一轮回？今日思潮往何处去？

自魏源写《海国图志》(1844)，到严复著《原富》(译《国富论》)(1902)。50余年之间，中国思想主流是“师夷长技”、强国富民、市场经济、议会政治。易之今言，即为普遍性的现代化论。代表者如郑观应、王韬、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一众人才，个个面目俊朗、心怀坦荡。杰出者有严复，译《天演论》、《国富论》、《法意》等，志将西方学理尽力输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启蒙高潮期应在严复的“原富”时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阐发的资本市场论，孟德斯鸠、卢梭、洛克著作呼吁的民权政治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的更新文化论，逐渐普及于坊间，正要转为实践。

梁启超曾是传播现代理论的一把好手。笔墨挥洒，势将市场论、民权论、文明论阐释殆尽。身体力行，意欲现代文明立现于神州。1903年2月，梁自日本横滨启航，跨海赴美。回来发表《新大陆游记》，播说见闻，畅论心路，大谈“新大陆”的优长，勇揭旧中国的丑短，惊艳之情，溢于言表。

想不到1919年西游一年后回来，思想剧变，霄壤颠倒。发表《欧游心影录》，惊呼西方文明已经“破产”，感叹“现代化”已成“黑影”。中国的摸索进步，仅为追逐“黑影”的游戏。他呼吁：沉沦的西方哀哀绝叫，求着中国人去“超拔”呢！

辜鸿铭1915年抛出《中国人的精神》，直论“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

[1] 盛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系主任、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黄遵宪史学研究》、《内核与外缘》、《解体与重构》、《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亚洲与东方学研究》等。主编“东亚学研究”丛书。

商业主义精神”。杜亚泉 1918 年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惊异地发现，当今地球变成“物质主义大狱”的地狱。

1922 年章士钊欧洲考察回国，得出经济竞争导致世界“血战”的结论。他论市场经济有二恶。其一，“乡里”与“通都”格差对立：“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其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增造富族，奢侈无伦”，一方面又制造贫困，民不聊生。

1939 年梁漱溟刊《乡村建设理论》，发现，“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主张在村落的基础上“均产”、“公田”、“合作”，实现梁氏“社会主义”。

上次的思想转向，并非空穴来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俄革命的成功、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称得上是主要的外部原因。有人说再加一条，美国凯恩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嫁接”成效。当然最引人的景致还是 1914 年战争的硝烟弥漫与 3 年后苏维埃朝日的喷薄而出，这一正一反的对比，让中国人兴奋惊愕，目光自然从西方骤转到北方。

其实单有外部原因不够，若无内因的接引，变化不会产生。近有拙著《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东亚文明的进化》，注意到被孟德斯鸠、黑格尔及马克思发现的原型亚洲三特征，这就是血缘村社的社会组织、原始公有的经济构造、东方专制的政治体制。血缘村社在中国体现为宗法村落，原始公有则对应中国的井田制度，古老的封建制度则是东方专制的中国写照。

原型亚洲特征让中国长期处于历史停滞的状态，在从古代土地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的跋涉中步履艰难。

旧亚洲特征在中国思想上体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阻滞改革的反市场理念；画地为“井”，阻滞物权改革的“井田”精神；维护封建宗法，延宕农村改造的“村落”主义。这些思想无时不与改革作对，维护原型亚洲的制度模型，形成顽韧的文化阻力与抵抗系统，而就是因其存在，成为引发 20 世纪中国大尺度、大面积思想倒退的内部原因。

这样我们就不能给予 20 世纪以梁启超、梁漱溟、辜鸿铭、章士钊等为代表的现代“反思”思潮打出好分数。研究梁漱溟比较著名的美国学者艾恺写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显见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哪里是在“反思”现代化，分明是一场“反现代化思潮”，客观效果是让改革的社会倒退，让进化的文明“返祖”。

平心而论，上述人士，我爱我敬，本为民族先贤，观其一生进步与功绩是主要的。一时失脚与转向，是可以理解的人生“试错”。严复不是也有“筹安会”话题吗？

爱国书中对此“反思”思潮，深刻写论，但不忙着做结论，而以史料的如实推出与思想的精辟解析，将人带引到一个悠远的思想世界。

导 论

自魏源《海国图志》提出“以农立国”和“以商立国”作为中西“立国之道”的根本差异，关于“以何立国”的“立国之道”问题就成为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先后提出了“以商立国”和“以工立国”，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以商立国”。“以商立国”与“以农立国”之争成为晚清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话题。政治上的民主与专制之争也以此为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以来，“以何立国”之争非但没有解决，反而由于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而更趋激烈，“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之间的论战接连不断。“以工立国”、社会主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主导性思潮。这些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自由经济思潮从晚清以来一直贯穿民国时期，但在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兴起以后，不断削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显处于低潮，其流派主要包括放任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个人资本主义）与非放任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包括自由资本主义的修正派与自由社会主义派等），胡适为“自由社会主义”代表，唐庆增为“自由资本主义”代表，马寅初主张“自由经济”与“福利经济”的结合，国民党主张“有计划的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思潮属于一种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思潮。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高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当时经济思潮的主潮。其流派纷呈，包括：“温和的统制经济”、“民主的统制经济”、“民生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乡村建设”派、“新法家”（经济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经济协力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战国策派”（国家主义计划经济与国防经济）、“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自由经济的统制经济化”等。基本类型大体可分成三种：一种是消灭市场机制的政府指令性计划经济；另一种为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指导型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本质上还是属于市场经济；还有一种就是主张市场与计划并存，但倾向于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

在民国时期的自由经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即使在自由经济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也属于非放任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其中含有“有意识的设计”（Conscious Control）、“经济法”（Rule of Law）、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等基本原则。如果说文化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比较强劲的话，那么，经济自由主义则在整个20世纪都是比较微弱的。无论是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计划经济

学说，还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说，都对经济自由主义持严峻的批判态度。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微弱，不是偶然的。一是生不逢时，从晚清推行经济现代化以来，西方即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而迈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贸易保护主义与扩张主义同时推进，结果，全球市场并不能够自由地平等地竞争，于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体制的中心地位，从实践上阻碍了自由企业体制的成长。二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应对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席卷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抑商”经济思想与“官营”经济体制接榫，迅速地融合在一起，而获得本土化的阐述与更新，从而有效遏制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三是近现代中国，不仅外患严重，而且有六次国难临头^[1]，民族危机始终不断，于是，国家主义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经济的国家主义目标极其功利地宰制着人们的头脑，经济自由主义缺乏成长环境。

思潮中“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含义使用得比较含糊，没有严格区分。等同者多，区别者少。概念没有厘清，使得关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论争，往往陷入自说自话，而不是有效的争鸣。正因为此，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只能是一个思潮，而没有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思潮。整个思潮流派纷呈，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流派，还有“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新法家统制经济”、“温和的计划经济”、“民主的计划经济”、非政府“计划经济”的“乡村建设”派、新民主主义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已现。多数计划经济流派都宣称自己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包括民生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市场经济”名词及其内涵已经由一些学者明确提出并阐述。马寅初于1948年在《经济学概论》中把“自由经济”界定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并断定“惟在进入大同世界以后，市场经济或可以取消”。而此前他对“自由经济”与“温和统制经济”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过详细的阐述。此外，吴世瑞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也对市场概念与市场体系进行了详细阐述。但市场经济概念及其话语体系并没有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与推广。当时实际上表述“市场经济”的话语是“自由经济”、“竞争经济”、“价格经济”、“赢利经济”、“交换经济”、“个人主义经济”、“民主的统制经济”、“温和的统制经济”、“同业自动的统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新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等。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极其强劲，源于国际经济恐慌引发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而国内经济恐慌、业已存在的经济体制与思想资源，则提供了接受并强化这种思潮的土壤。影响所及，不少自由经济论者转化为新自由主义或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者，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等。当然，有不少人主要是话语体系的转换，其实质变化并不大，但也足够说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话语体系之强大。还有不少自由经济论者一度对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怀有好感，如胡适与丁文江等。在当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与自由经济思想的交叉和融合

[1]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8—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7—1945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是两大思潮的共同特征。如“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有时又称为“有计划的自由经济”。

在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中，对“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类型与性质没有得出一致看法。关于类型，有多种划分：有社会主义型，资本主义型，法西斯主义型，过渡型；民主型与独裁型；温和型与激进型；大规模型与小规模型；全面型与局部型；营利型与自足型等。关于性质，有中性说，社会主义说，资本主义说，过渡性说，政治性说，道德性说，两种性质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性质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

从中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内核看，深刻影响我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国外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德日意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思想。受其影响的主要为中国新法家经济国家主义思想、战国策派国防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法西斯统制经济协力经济思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这种统制经济思想虽然仍然承认私有产权与私营企业，但由于其奉行经济上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义以及经济与政治国防的一体主义（即所谓“以平时为战时”；“民生与国防合一”），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与实际上的全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没有多大差异了。二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受其影响主要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1948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苏联经济体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赢得了包括很大一部分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在内的绝大部分国人的高度赞扬。甚至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论者也转而表示要吸取其合理内核。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全能计划经济体制，私有产权被彻底取消，市场机制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压缩，个人经济主权名存实亡，同时政府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三是欧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受其影响主要为民主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温和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这种体制仍然维护私有产权、企业自由与市场机制，但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扩展了国家为经济服务的各种职能，甚至也允许国家直接经营一些关乎国家安全与国民生计的重大事业。

“计划经济”思潮顺应当时国内外经济形势与经济理论的更新而出现，有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但作为特殊的经济与社会动荡时期的产物，是否也能够作为社会和平稳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手段，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其中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不顾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试图把指导能力有严重缺陷的政府变成一个万能的政府，无微不至地掌控经济发展，是绝对不应提倡的。阻碍人民在经济生活中满足经济需求、追求经济利益、发挥经济常识的政府，必然会限制经济发展。经济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有限政府、法治经济、社会保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要件。

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思潮的具体名号不完全是叫市场经济，而是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其主导形态经历了一个从自由经济到统制经济，进而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历程。主要流派大体有二：一类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流派，主要有“自由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型的市场经济，“同业自动统制”型的市场经济，“民主统制”型市场经济，“温和

统制”型市场经济；另一类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流派，主要有“新民主主义”与“新资本主义”。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思潮具有根本的认识误区与内在缺陷，主要是没有清晰的市场经济概念与解释系统。基本上说，虽然出现了新民主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经济流派，但完全是在资本主义的视野与框范下进行探讨与解释的。“市场经济”没有与“资本主义”分离，“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搅混在一起。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存在认识误区，因此市场经济没有与社会主义真正结合在一起。因此，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思潮没有从根本上深入人心，其所表现的“自由经济”思想终究为“计划经济”思想全面覆盖。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思潮仍然有其成就，这种成就既为计划经济全面实施时期提供了批判性思想资源，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启发性思想资源，更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建设性思想资源。

马寅初与张君勱、张东荪属于调和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个个案。他们都认识到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利弊，试图扬弃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提出温和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后者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案。马寅初经济学说的话语，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经济转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但其主张以自由经济为骨干的市场经济基调并没有根本变化。一直到1948年，马寅初仍然强调，或许只有人类进入“大同世界”，市场经济才可能取消。市场经济必将长期存在，因为只要分工与短缺存在，市场就不会消亡。而只有分工，才能求生产快速增加。无论是自由经济，还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产，增加社会财富，但马寅初强调劳工保护与社会保障均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均富”，是建设“均富社会”。张君勱、张东荪主张调和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走中间路线，即国家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其计划经济思想，虽然吸纳了苏联全能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全盘计划思想，但并不主张全盘公有公营，而是主张公产与民产并存、公营与民营并进；而且主张全盘计划，却非全盘统制，仍然容许企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计划为了生产，但没有脱离市场；政治民主化，计划没有强制性，强调人民自觉，因此，本质上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不过不是民营经济自发的市场经济，而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并存、政府加以全面指导的市场经济。

孙中山与马寅初均主张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文明性，克服资本的野蛮性。孙中山认为资本具有双重属性，即文明与野蛮集于一身，其文明性在于生产性，而其野蛮血腥的一面在于其垄断性或专制性。提出“资本家无良心”的观点。孙中山主张利用资本文明性的一面，以发达实业，而限制资本野蛮血腥的一面，以增进民生幸福。具体方法是以“节制资本”限制资本家对资本的垄断；以“平均地权”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垄断，特别提出要严防资本家与地主合二为一。马寅初提出“劳动果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的观点，强调“要增加劳动的能力，须先普及教育及增加资本”。主张既要化解资本流动的困难，多方解放资本，利用资本发达实业，也要进行劳工保护，使得劳动与资本能够结合双赢。

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化发展道路的三次论争高潮。论争的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但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得到充分理解。不过，检讨论争史，联系现存的三农困境和新工业化问题，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应时化、简单化、公式化、理想化和非理性化的错误。论争过多地受国际环境和政治形势的影响，也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极其缓慢，结构性制约导致论争没有得到充分的、理性的展开。论争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经传注疏思维的影响，成为为领袖人物的言论和政府政策做注释。论争并没有对长期困扰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个既切合当时实际，又富有战略发展价值，并为学界、舆论界和公共政策界所广泛接受的基本思路。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高涨期间，在《独立评论》上发生了关于乡村建设话题的多次论争，环绕的有关问题包括：其一，乡村建设运动有无必要？其二，乡村建设与都市建设的关系如何？其三，乡村建设理论错在哪里？其四，乡村建设实践是基本失败，还是颇有成绩？其五，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指导或参与乡村建设？其六，政府在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如何？其七，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前途应该乐观，还是悲观？《独立评论》杂志社同人并不看好乡村建设运动，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但同时也发表了不少乡村建设运动的亲历者、支持者、同情者的申辩文章。考察、梳理并检讨这些论争，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进行新农村建设不无裨益。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环绕乡村建设问题的讨论取得一定的成绩，但长期困扰与制约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特别是乡村建设派对本国国情与现代工业的看法有很大的歪曲与误解。而都市建设派也没有对城乡工农联动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做出可行的制度安排。

章士钊与梁漱溟属于热心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个案。但他们的解决都误入歧途。章士钊提出非工业化非市场化的“农国”方案，充分认识到工业化市场化对人的异化的一面，却忽略了其解放的一面；倡导“以农国精神兴工”，有其人文精神张扬的一面，也有其严重复古的一面；其“农业救国”论，有渴望国家富强的一面，但在实际上却有着鄙弃物质文明的严重倾向；其向往“握笔为士，罢笔为农”的理想农民，有解放农民的一面，但主张“以拙胜巧”、诋科技为“奇技淫巧”，却存在愚民和鄙弃科学技术的倾向；其主张“农村立国”、“村治”，有使农村免遭破坏的一面，但不符合“万国交通”的普遍联系趋势。梁漱溟以乡村“社会”本位和乡村“理性”精神为基础的乡村建设构想，有其合理性，也有中国特色，但却根本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又亟需发展生产力的国情，也不符合世界普遍性联系发达的趋势，在以开放、竞合、拓展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也难以独自幸存。

“保守与激进”之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中心话题之一。论战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主潮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二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旷日持久，争论却依然不休。取得的主要成绩有二：一是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

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二是在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的同时，意识到：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从现代性的坐标来看，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处在保守主义的笼罩之下。

晚清以来至今先后兴起了三次西学、三次国学和三次现代化思潮。“西学”与“中学”、“国学”之争，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核心命题。自“五四”运动到1949年以前，中国文化建设路向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一个中心话题。“西化”和“本位”间的论战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和张力。交锋的结果，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社会亟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西化”和“本位”的概念最终归趋于“现代化”。这场论战不是简单的文化论战，也不能仅仅作为历史陈迹来看待，而应该把它看作中国现代化路向转换的一个坐标。重新发掘和认识这场论战，有助于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晚清以来，儒家面临着现代化的滔天大势，不得不做出艰难的调整，以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在“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以前的儒家对“西方化”和“现代化”没有加以分梳，对“西方化”的反抗是连带“现代化”一起反抗的，而此后的反抗则是反“西方化”，而不反“现代化”。儒家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反抗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调适过程。“反抗”与“调适”是互为作用的。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前后）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20世纪以来唯物史观流播中国，使得中国革命、思想、学术、史学发生了重大转型。《新青年》学人诠释唯物史观受到作为传播中介的日俄学界和中国社会需求的深刻影响，非常突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又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唯意志论发生了深层勾连。唯物史观被引入史学领域，中国史学发生了“科学化”转向。物质史观、经济史观、进化史观、平民史观受到推崇，神学史观、精神史观、恒定史观、循环史观、退化史观、英雄史观受到批判，对中国史学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顾民国现代化思想的历程，我们发现，有几个时间节点对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较大，如1914年“一战”的爆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1919年巴黎和会的召开，1928年以后斯大林模式的急剧推进，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1931年日本对华侵略战

争的爆发，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特别是1914年、1917年与1929年。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复兴思潮，包括东方文化论、人生观论、以农立国论、新人文主义等，源于中西方学术界对“一战”中西方文明为争夺世界市场自相残杀、物质文明空前破坏、先进科技用于大屠杀的反思。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行，源于中西方学术界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极端的贫富分化、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高涨、乡村建设思潮的如火如荼、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思潮的兴起，源于对世界性经济危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的反思。而日本对华侵略由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影响甚大。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和苏联计划经济分别对中国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法家与战国策派的兴起，源于世界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

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历程，一方面固然受欧美社会形势与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出于对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艰难探索与反复思考。晚清先进之士看到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跨海而来，以廉价的商品倾销中国，而商民在政治中的影响巨大，故认为西方富强之源在于“以商立国”、“兴民权，设议院”。民国学术界则发现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歧途与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的虚化，同时俄国“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则昭示了另一种值得向往的美好愿景，转而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民族文化建设。民国时期，西化思潮与民族本位思潮、以农业立国思潮与以工立国思潮反复较量，出现拉锯形势，相互排斥又相互吸纳，说明现代化探索存在一种内在挣扎与困境。从晚清到民国，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取代以商立国、自由经济；东方文化、本位文化、民族文化取代欧化、西化；现代化取代西化；以工立国取代以农立国等，成为现代化思潮的主流，是历史的必然。而这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思想基础。

目 录

第一编 经济与社会

第一章 微弱的自由经济思潮	002
第一节 自由经济思潮	002
第二节 流派	014
第三节 检讨	026
第二章 勃兴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	045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	045
第二节 流派	070
第三节 思潮评价	088
第三章 工业化的艰难抉择：20 世纪上半叶工业化与农业化道路之争	116
第一节 20 世纪 20 年代围绕“以何立国”问题的论争	117
第二节 20 世纪 30 年代围绕“如何救济农村”问题的论争	121
第三节 20 世纪 40 年代围绕“以何立国”问题论争再兴	127
第四节 对论争的检讨	131
第四章 应急与赶超的辩难：20 世纪 30 年代乡村建设之争	134
第一节 关于乡村建设运动之争	135
第二节 成绩与问题	150

第二编 思想与文化

第五章 激进还是保守？——近代社会思潮主潮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154
第一节 “激进与保守之争”的来龙去脉	154
第二节 对“激进与保守之争”的总结与反思	170

第六章 传统的发明：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建构	176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视角下“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三种范式	176
第二节 现代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明	177
第三节 现代性对立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明	181
第四节 传统之现代：新文化运动建构现代性的反思	185
第七章 现代化共识的养成——20世纪上半叶文化建设路向问题的论战	188
第一节 全盘西化派	188
第二节 本位文化派	193
第三节 对两派的批评	195
第四节 现代化共识的养成	203
第八章 儒家与现代化：反抗与调适	214
第一节 儒家对现代化的反抗	214
第二节 儒家对现代化的调适	220
第九章 建构与解构：现代新儒家对工业化市场化潮流的回应	241
第一节 现代新儒家对工业化市场化的基本态度	241
第二节 建构主义：对工业化市场化的呼应与适应	244
第三节 解构主义：对工业化市场化的批判和纠偏	251
第十章 唯物史观引入与中国史学现代化——以《新青年》为中心的考察	256
第一节 《新青年》对唯物史观的传播	256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诠释特点	258
第三节 唯物史观与史学转向	262

第三编 个案剖析

第十一章 东方文化危机的过度反应：章士钊的三农思想	268
第一节 章士钊三农思想概说	268
第二节 围绕章士钊农国论的论战	276
第三节 反思与评价	279